

手机这玩意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对于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,手机的印象最初和香港的黑社会联系在一起,很大,像一块可以用来砌墙的砖头,只有黑社会老大才会使用,我们称之为“大哥大”。

手机很快就普及了,人手一部,这个发展过程快得惊人。再后来,手机上的阅读就普遍了,手机不再是黑社会老大的专利,不再是仅仅用来聊天说话。手机的阅读功能,已经超越了炫富和通话。有几张图片很能说明问题,在我们中国十分流行,一张是抽鸦片,一张是看手机,姿势都差不多一样。

为了改变这种现象,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读书节,都举办形形色色的读书活动,号召民众读书,不遗余力地宣传读书的意义。中国人曾经是最喜欢读书的民族,古语说得好,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,我们相信读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。可惜这些年的行情完全变了,我们的媒体上经常会表达出这样一种遗憾,那就是中国人好像都放弃了阅读,与其他国家的民众相比,反而是外国人更乐意阅读。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,说俄罗斯人躺在草地上读诗歌,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地铁上看小说。

当然不是这样,事实的真相显而易见,全世界都在低着头阅读手机。俄罗斯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,他们和中国人一样,都在目不转睛地看手机。这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,算不上什么好事,也未免就是了不得的坏事,它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。因此,只是讨论应该不应该在手机上阅读,完全没有意义,可以进行一番讨论的也许只能是,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,究竟能读到些什么。

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鲁迅曾经说过一件事情,他母

【灯下碎语】

叶兆言:阅读是自由的

亲作为一名家庭主妇,作为一名著名作家的哺育者,也喜欢看些小说,不过从来不想看他写的那类小说。鲁迅的小说曾经很流行,在当时是文学青年的《圣经》,而她看的小说同样也很流行,在报刊上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。同样是小说,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,有着不一样的品质。在评论家眼里,在文学史上,鲁迅母亲看的那些小说可能都是低俗的,不入流的,但是鲁迅先生并没强求母亲提高文学口味,强求她去读自己的文字,强求她去读他心目中认定的优秀文学作品。为什么呢?因为鲁迅清楚地知道,在现实生活中,写作是自由的,阅读也是自由的,人有选择自己要读什么的基本权利,即便是儿子,也没权利强求母亲去读什么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所谓为读者写作,有时候就可能非常可疑,就可能是一句十足空话。迎合读者,读者要读

什么,我们作为作者就为他们写什么,完全有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合适,非常不正确。毫无疑问,作家必须要有理想,他永远都是在为潜在的读者服务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作者和读者都是在寻找,都在寻找他所认同的东西。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认同,读者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认同,大家各司其职,大家各取所需。换句话说,作者和读者的关系,有时候就像鲁迅母子,母亲要读她想读的东西,而儿子只能写他想写的东西。

我离开大学以后,在出版社当过编辑,深知读者趣味的不可捉摸。对于作者来说,很多事说起来容易,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。一方面,我们不知道读者想读什么,觉得自己很努力,在充分地为读者着想,实际上,更可能是盲人摸象,是想当然。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自以为是的困境中,我们盲目地生产,结果读者根本不接受那些为他们定制的产品,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理睬我们。我们的辛苦努力,最终变成了一个个笑话。另一方面,有时候,我们确实可以聪明地知道读者需要阅读什么。出版社因此可以赚钱,因此有了良好的经济效益。明知道在文学创作中,流行和时髦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,但是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可能免于利益的诱惑。

时至今日,在中国搞出版还是个赚钱的好买卖,尽管大家都在抱怨,纸媒的辉煌时代已不复存在,都在抱怨手机阅读给出版社的利益带来致命打击。

今年8月8日,中国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权威的《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》,这份报告有个非常重要的结论,就是“2015年纸书的销售相较于2014年,不但没有下降,反而有所增长”。我对这个数据不感兴趣,感兴趣的

是它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,譬如“数字出版”增加了百分之三十,这个数据与手机阅读是可以互动的。又譬如期刊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二一,报纸减少了百分之十点二七。而且,这些数据说的是2015年,甚至是2014年,2016年又会怎么样呢?当然还是应该增加的继续增加,应该减少的继续减少。

最后还是回到手机阅读上,首先,手机阅读和吸食鸦片没有什么可比性,并不像媒体上认定的那样有害,它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,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人上瘾,都可以让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。其次,手机阅读并不能表明读者的阅读兴趣有什么本质改变,中国人有句俗话,什么人玩什么鸟,手机上确实有很多无聊信息,无聊是因为有无聊的需求,有无聊的供给。手机屏幕只不过是更加形象更加生动,同时又是更加数据化地演绎了人们的阅读生态。它代表着我们有可能更快地读到你想读的东西,它更方便,也更直截了当。

不少年轻人跟我谈起过网络小说,他们对这些小说表现出来的热情,远比阅读世界名著更大。很显然,我们已经无法避开网络时代,一位法国作家非常认真地告诉我,他在手机里存了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觉得无聊时,会很随意地看上几页。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,而且还相信,一定会有人用手机来阅读《红楼梦》,阅读唐诗宋词,阅读鲁迅的著作。但是说什么也不相信,我不相信在网络时代,优秀的文学作品会没有立锥之地,不相信文学会因此就死亡了,就不存在了。我相信,如果阅读仍然是自由的,必然会有人选择更优秀的文学,如果写作仍然是自由的,必然会有人写出更优秀的作品。

(本文为叶兆言在韩国东国大学的演讲,有删节)

【书中风云】

潘柳黛差点

把张爱玲骂哭了

苏青、潘柳黛、张爱玲、关露,据传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的“四大才女”,其中潘柳黛与张爱玲发生了一段笔墨官司,且纠缠数十年而不休。

潘柳黛本名思琼,别名柳黛,1920年2月12日生于北京市东城区一个旗人家庭。1940年,潘柳黛到了南京,在《京报》副刊当誉稿员,因文笔出众,不久转为记者。随后潘辗转于几家小报当编辑,并给各小报写专栏,“享受着如同女明星般的瞩目”。

所谓“四大才女”的说法,应是此时流传开来的。

然而,据学者祝淳翔考证,“四大才女”可能是潘柳黛的自炫,当时小报确有四女作家之说,有时指丁芷、张宛青、潘柳黛、苏青(因四人都曾离过婚),很少有人将潘柳黛和张爱玲并列在一起。原因是:“潘柳黛的作品,芜杂荒乱,野气冲天,而又野而不悍,就觉力薄,实在是不能与张、冯(苏青本名冯和议)并论。”

潘柳黛一生严肃创作不多,代表作是1945年出版的《退职夫人自传》,被誉为“(与)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经典的苏青名作《结婚十年》堪称‘双璧’”,潘柳黛还有一本少有人知的长篇小说《一个女人的传奇》(可能写于上世纪50年代),两本小说均展现出女性主义视角。

张爱玲曾借苏青的话来评价潘:“这种女人,腰既不柳,眉也不黛,胖得像箩筐,装得倒是风情万种的样子,其实骨子里俗得很。”(后半句可能是张自己加上的,未必是苏青的意见)对于超重,潘柳黛自己倒是看得开,曾说:“有人看见我名字,总以为我一定是瘦比黄花的样子,我说那是因为他只看到柳枝,没有看到柳树的缘故。”

潘柳黛的写作“以多幽默感和热情横溢胜”,常夹杂不必要的刻薄词句,这从她得罪张爱玲的那篇《论胡兰成论张爱玲》中便能看出。

1944年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三卷(五六月出刊)上,胡兰成写了《论张爱玲》一文,提到张爱玲的“贵族血液”,赞美她的创作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。

潘柳黛反问:胡兰成何时“横看”和“侧看”张爱玲了?暗示二人关系不正常。对于“贵族血液”,潘柳黛则嘲讽道:张爱玲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,这种关系就像太平洋上淹死一只老母鸡,吃黄浦江水的上海人却自称喝到了鸡汤一样。文章化名“真西哲”,因胡的文章说张爱玲的个人主义可与西哲苏格拉底、卢梭相提并论。

在苏青提醒下,张爱玲才注意到这篇文章,读后“一时气得浑身发抖……差点流下眼泪”。

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?潘柳黛的解释是:“当时我只顾好玩,说得痛快,谁知以后不但胡兰成对我不叫应(照应的意思)了,就是张爱玲也‘敬鬼神而远之’,不再与我轧淘(交朋友之意,吴语)。”

而张爱玲的解释是,一次潘柳黛和苏青预约上门拜访张爱玲,张特意穿了件柠檬黄露臂晚礼服等她们,以示郑重,可二人迟到了5至10分钟,门铃响时,张爱玲对佣人说:“秦妈,告诉她们,本小姐现在不会客。”潘柳黛站在前面,看到了张爱玲,便问她是不是有贵客,但张还是请她们吃了闭门羹。半个月后,苏青打电话给张:“你不好好接待潘柳黛,遭报应了。”苏青所说的“报应”,就是潘柳黛的那篇文章。

从潘柳黛的文章中可以找出蛛丝马迹,她在1975年发表的《记张爱玲》中,曾写道:“她(指张爱玲)在上海时,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,虽然没有毕业,但教会学校的神髓却被她领会到了……她的时观观念,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。”

恶骂张爱玲,或可从潘柳黛个人经历的角度去理解,潘因专栏成名,因为她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,话说得越绝对越激烈,得到的回报就越丰厚,这使潘对文字的“社会意义”产生误解,将四处树敌、人身攻击当成批判。

(摘自《北京晚报》,文/唐山)

【史海钩沉】

道光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

紫禁城骑马、坐椅子轿、跪毡垫

员就费劲了。于是开明的康熙皇帝恩准那些年老的官员在紫禁城内骑马上班,实是皇上对下属的体恤。不过这项规定,只限于朝中大臣,外放的地方官极少有这种待遇。林则徐进京面圣,作为一个外放的汉官,却享受到了这种待遇,就连他自己都说:“外僚如此,尤异数也。”

得了这样的恩遇,第二天一早林则徐受宠若惊地骑着马上朝了。虽然他的骑术不怎么样,但还是引来同僚的一片羡慕和嫉妒之声。俗话说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,与这种殊荣如影随形的是同僚的嫉妒,这后来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悲剧。林则徐并不是一个张扬的人,但道光帝的这份恩宠,君命之下,不得不行。召见时,两人继续讨论禁烟问题。最后,皇上问他,骑马怎么样,林则徐只好如实回答:“臣不习惯骑马,还是请圣上恩准臣步行入内觐见吧。”想不到林则徐的这番回答却得来更大的恩宠,道光帝说:

“你不习惯骑马,可坐椅子轿。”天子再次降恩,林则徐哪能不知好歹,只得叩头谢恩。后来的四次召见,林则徐都是乘椅子轿上朝的。

12月31日,林则徐坐着椅子轿上朝了,这是道光帝第五次召见他。在这次召见中,

在当时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多是些朝中老臣,按朝廷惯例,朝廷官员上朝要沿着指定路线行走。偌大的紫禁城,要走到金銮殿见到万岁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对于年轻力壮的官员来说这不算什么,但对于那些年老的官

道光帝用征询的口气问林则徐:“朕想任命你为钦差大臣,让你代表朝廷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,广东水师也由钦差大臣兼归节制。很显然,此次谈话下来,道光帝的态度已经很明确:鸦片泛滥“事在今日,未能断其祸根,毕竟有外国商人私带鸦片。若能严治他们,将夹带的鸦片焚烧净尽,令不敢输入我国,纵使国中尚有所存,久之必吸食竭尽,其害自灭”。于是决定派出钦差大臣,把禁烟重点放在查禁广东海口走私上。此次临朝,道光帝对林则徐相当满意,他给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、坐椅子轿的恩遇,目的是想给朝臣们这样一种印象:林则徐是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,是皇上信任的人。他要向朝中的官员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。

林则徐八次被召见,道光帝都让他跪在软毡垫上。一般的臣子可都是跪在地上的,这当然又是一种恩宠。从紫禁城骑马、坐椅子轿到跪毡垫,他已经让同僚们够嫉妒了,现在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,全权代表皇帝到广东禁烟。朝廷文武大臣谁能享受这种待遇?阅遍大清历史,恐怕也只有林则徐一人了。

(摘自《晚清外交七十年:两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碰撞》,李书纬著)